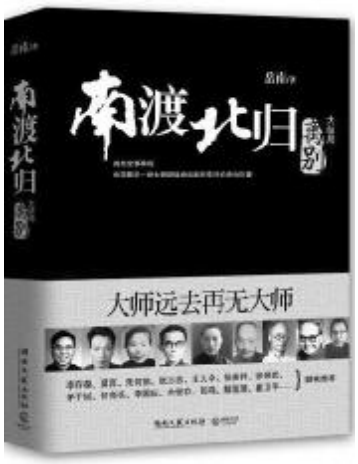
继《南渡北归》的前两部“南渡”与“北归”出版后,近日,大结局“离别”正式面世。以详尽史料、恢弘场景构筑起来的煌煌百万字巨著《南渡北归》,也迎来了令人震撼的最强音——20世纪知识分子在南渡、北归之后,开始了悲怆大离别。

离别的触动 文脉的追寻



《南渡北归:离别》,岳南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5月出版,定价:48.00元

□本报记者 李芸

曲终人散伤离别

“傅斯年之死”、“林徽因之死”、“吴晗之死”、“曾昭抡之死”、“陈寅恪之死”……读《南渡北归》第三部“离别”的目录,就知道这将是极为沉重的一部书。大师生离死别,一个时代也就此终结。

《南渡北归》三部曲描述了20世纪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剧烈变迁,从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写起,一直写到抗战胜利,解放战争结束,尔后直到哲学大师金岳霖死去的1984年,时间跨度将近半个世纪。在这期间,中国的学者、大师们从南渡——逃亡西南,北归——回到北京,再到离别——留守或是跟逃国民政府迁往台湾。

该书作者岳南说,第三部“离别”是新一轮的“南渡”与“北归”。流亡西南的知识分子,在回归久违的故土家园之后,因内战爆发和各自的政治歧见,最终不得不再作抉择、忍痛离别,一部分人跟着共产党北归,一部分人跟着国民党南渡到台湾海峡,从此台湾大陆天各一方。不同知识分子在这一时刻的选择,以及在海峡两岸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政治氛围中所遭遇的命运剧变,也决定了他们最后的命运。

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如胡适、梅贻琦、傅斯年、李济、董作宾、钱穆、毛子水等,随着内战爆发,携家带口,越过台湾海峡,进行第二次南渡,并最终“归骨于田黄之岛”,死后备受哀荣。而陈寅恪、吴宓等一批知识分子,则在南渡中突然改辙更张,回蓦故土,仓皇张望,不知如何适应,终于在大时代的革命洪流中哀婉地死去,身后情境凄凉。更有一批北归后原地不动的知识分子,紧守故土,积极改造,其晚境不是投湖便是上吊,如向达、汪钱、陈梦家、傅乐焕等等。也有一部分投靠江青等权贵,红极一时,最终又陷于世人皆曰杀之的尴尬之境,让人欲哭无泪、扼腕告叹……

岳南:“离别”是三部曲中的精华与高潮,是我最看重的一部分。我们说做作文,把开头、结尾做好了就成功了一大半。“离别”是结尾,当然我认为这一部分重要并不全因为这些,而是这一部分是为大师坎坷、悲怆的最后岁月谱写的挽歌,有着苦难之美、悲剧之美、苍凉之美,这种凄美会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心灵震撼。

在第一、二部中,学者、大师们所受苦难并不少,但当时的大环境即是如此,在二战的背景下,大多国家的苦难只是多和少的问题,中国并不特别。第三部的悲剧却不是哪个国家都有的,当看到这些大师的离去,并不只是败给时间,败给生命本身,心中的苦闷与悲痛难以复加。

谋篇布局学“水浒”

要做好《南渡北归》这篇“作文”,岳南对开头的重视不亚于结尾,自2003年春开始采访收集资料起,他就时刻在谋划从哪里切入这个故事。《南渡北归》三部曲人物众多,涉及有名有姓的知识分子有一百多人,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写出一本大部头的专著来,如何找出统一的线索来贯穿全书?

岳南说《南渡北归》的结构借鉴了《水浒传》的创作手法。在《水浒传》中,施耐庵从史进讲到鲁智深,鲁智深遇到了林冲,林冲遇到了杨志,杨志牵扯出生辰纲,于是吴用、晁错、宋江等人陆续登场……

《南渡北归》三部曲中所写人物的数量上接近《水浒传》的一百单八将,纷纭复杂的人际关系,就像一张网,牵一发而动全身。岳南以建筑学家梁思成为突破口,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携全家与清华教授金岳霖逃亡开始,讲到他们在长沙遇到了李济,于是以李济为由头,牵出了逃亡之前包括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陈寅恪、吴宓和校长曹云翔、教务长梅贻琦等人的故事。然后继续讲述李济的故事,直到1928年,李济在广州中山大学遇到了傅斯年。傅斯年被带了出来,这个人物相当于水浒中的宋江,是整部著作的核心人物。有了这个核心人物,其他的也就纲举目张,一个个鲜活的人物渐次蹦跳出来。

岳南:《南渡北归》借鉴《水浒传》的灵感来源于一次实地考察。当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社会科学研究所以及中国营造学社,都流亡到李庄郊外一个号称栗峰山庄的地方。我到那时发现这个地方是一座连绵大山,背靠长江。山庄无论是地理气势还是庞大壮观的程度,都堪与小说《水浒传》中描述的水泊梁山有一拼。而且傅斯年来到栗峰山庄后,对同仁说过:“当年宋公明与武松等人落草为寇来到了水泊梁山,我们这些读书人如今也算是落草了,不过我们不是寇,我们是一百零八条好汉,是为了打败日寇而来的。”当时我便豁然开朗,这可以看做是中国的古典名著给予我的精神和艺术营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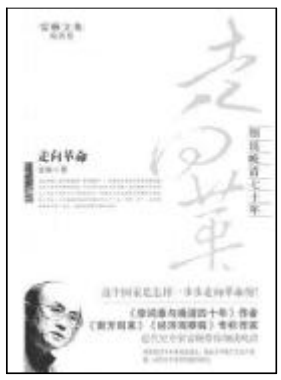
独立自由续文脉

“大师远去”、“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很多读者在阅读了《南渡北归》第三部“离别”之后发出这样的慨叹。为什么大师之后再无大师?这与近年我们热烈探讨的“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个著名的“钱学森之问”,有着同样的诉求。岳南说,“离别”其实是解释了“大师远去无大师”的原因的。

岳南: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悲剧,人们自然会受到启发,会看到历史的教训。为了写好“离别”,我在“南渡”、“北归”中作了很多铺垫。如果曾昭抡、陈梦家、吴晗、穆旦他们的晚年生活比较好的话,我是不会在前文中对他们的家族作那么多描述的。从他们家族的兴旺与他们后来的悲惨命运,特别是他们家族毁灭的对比中,我们会知道为什么我们文化传承的血脉会断掉。在“曾昭抡之死”一节的最后,我写到“曾经盛极一时,诗书传家延绵五代之久的湘乡荷叶塘曾氏家族,随着曾昭抡、曾昭橘兄妹这两颗耀眼明星的陨落,其家族成员在大陆的声名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声播四方、名扬天下的豪门世家,连同这个世家的文化遗存,在精神层面上已香消玉殒,消散殆尽,于日后的神州大地不复见矣。”穆旦家族、叶企孙家族、胡适家族等等都是如此……

但我们的大学要培养大师不是不可能,这不是一个梦想,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就有过大师,就有过西南联大这样的学校,那时他们住的是茅草房,吃不饱穿不暖,时不时要躲避飞机的轰炸,但就产生了陈寅恪、饶毓泰、叶企孙等等这样的大师。我觉得现在的教育必须回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十字方针上来。一个学者若无上述之精神和思想,人云亦云,或成为当权者的附庸跟班甚至奴才。不但这个学者无前途可言,整个中华民族也离灭亡不远了。这就是我写这部书给世人的一个启示。

杂文笔法下的晚清社会



《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雷颐著,山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3月出版,定价:29.80元

□舒榆

1867年7月21日晚,两江总督曾国藩与幕僚赵烈文聊天时说:“京中来人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烈文回答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与赵烈文的这段对话,被雷颐在《走向革命——细说晚清七十年》里所引用。按照赵当年的说法,大清国的寿命不会超过五十年。实际上,从1867年开始算起,到辛亥革命为止,大清朝根本就没有熬过五十年。

与赵烈文的认识差不多,曾国藩也认为大清国撑不长久。但,他并不同意赵的见解。按照赵的意见,清帝国瓦解之后,各地将陷入各自为政、军阀混战的局面。但,曾国藩认为,清廷瓦解之后,并不至于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最多像东晋或南宋那样偏安一隅罢了。

事实证明,身为幕僚的赵这一次说中了。辛亥之后,确切地说袁世凯去世以后,各地军阀纷争,搞得不可开交。这一乱局,一直持续了几十年。

大清国有四亿人口,面对如此乱局,持有曾国藩一样见解的人并不在少数。不过,如何应对这个乱局,解决面临的危机,当年却有不同的看法。清廷即将覆亡之际,满洲贵族良弼当时就读于日本东京士官学校,亲眼看到革命风潮如火如荼。面对此情此景,良弼说:“不用害怕,这些人每月给他们数万金银,赏一顶戴,他们就会闭口了。”

在良弼们看来,暴力革命是可以通过金钱和顶戴“赎买”的。这个方式确实有一定效果。不过,良弼们或许从来没有想到,革命党可以威胁他们的统治,底层的老百姓同样可以威胁他们的统治。否则,太平天国运动从何而来?陈胜吴广的起义从何而来?一味无廉耻地压榨底层,必然导致民心丧尽、前途无望。所以,当年的清廷并没有真正客观认识到所存在的问题。它不愿放弃任何权力,并过于相信自己力量的强大,仿佛历史可以按照它理想的节奏发展。因此,它只是被动地在重重压力之下“走一步算一步”,却又基本踏步不前。这时,政治的逻辑只能是革命。

雷颐的这本《走向革命》,其实是对晚清七十年的“细说”。它不太重视对整个事件进行全角度的分析,却尽可能选择一些历史的边角料。试图从细节里一窥历史的本来面目。在这本书里,作者再次“发现”了历史中的某些细节。甚至,通过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进行解读,从而揭示出近百年来悲剧的根源。

这本书里,有一个细节颇值得玩味。1841年元月,广东的大角、沙角炮台又被英军攻占。道光皇帝荒忙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一万七千余人开往广东,与英军作战。古稀之年的杨芳是湖南提督,曾是林则徐部下。到广州的第二天,杨看到英国军舰上的大炮总能击中己方,但清军的大炮却不能击中对方,于是认定“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于是广贴告示,“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作为制胜法宝。他将这些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命令一位副将在木筏上掌控,以马桶口面对敌舰冲去,以破邪术。当年的3月18日,英军进犯,杨芳的这些招术完全无用,筏上副将仓皇而逃,英舰长驱直入。

传统文化需要祛魅,确实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罢。

一个帝王的辩白

□么辰

史景迁的中文名字取自“学历史要景仰司马迁”,虽然他曾被钱锺书戏称为“失败的小说家”,其特有的“说故事”式的叙史方式也受到多方质疑,但专攻中国历史的史景迁仍不失为一位出色的史学家,因为历史本身就是由一个个或是条分缕析、或是晦暗不明的故事或者片段组成的,这一点毋庸置疑。

中国人的著史方式除了纪传本和编年体外,有一种叫做纪事本末体的体例,就是按照事件的发生、发展、结果来记录历史的;并且连史景迁的偶像司马迁都偏乎猎奇。比如在《史记·赵世家》里写到的赵盾做的那个“兆绝而后续”的梦,做梦者为赵盾本人,后世的司马迁又何从知晓?号称每一个藏书家都该有的吉本的史学名著《罗马帝国兴衰史》,也是遵守“说故事”的基本原则。所以只要记载的是真实的人与事,方式可题只是小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还是《追寻现代中国》,史景迁的著作都是第一流的史学作品。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很吸引人,因为雍正皇帝这个人本身很惹眼。在中国的帝王中,雍正皇帝也许不是干得最好的,但却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勤奋的帝王。根据当时的法律,三品以上的1,000多名高级官员,都有资格给雍正皇帝写密折,而他都要在上面留下自己的意见,哪怕只是一个“阅”字,或是“知道了”这样简单的批示。根据清宫档案,雍正皇帝只有在自己生日那天才可以休息,在当皇帝的这13年时间里,他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足4小时,在数万件奏折上面写下的批语多达1000多万字。这个纪录在中国的皇帝中是空前绝后的,其敬业程度可想而知。

封建时代末期的中国习惯上被称为老大帝国,虽然它的历史页面总是被不断地刷新,但是难有真正实质性的变革发生,像是黑格尔眼中的中国:“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然而,这却注定了中国历史的规律性,一朝一代的兴衰成败大抵可以分为开国、守成、凌夷、式微四个阶段。很显然,雍正皇帝正好处于守成这一阶段,事实证明他的任务完成得很好,政绩颇为可观:整顿吏治、摊丁入亩、火耗归功、征服青海、治理西藏等等,有人说清朝绵延260多年的统治,雍正居功至伟。然而就是这样一位帝王,从他的登基、施政、驾崩,处处为流言与争议所缠绕,种种千奇百怪的政治绯闻始终伴随着他,很多谜团直到现在仍然处于未解状态。

明末战乱,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八旗铁骑平定海内,按照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的说法:“夫以十万之众,而服十五省之天下,岂人力所能强哉!”以这样少的兵力,一向被汉人视为夷狄的满洲人最后竟能入主中原,爱新觉罗家族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收获了最为丰厚的报偿——成为之后260多年中国的主人,这本身就注定了满汉族群间潜在的巨大矛盾,进而衍生成严重的政治问题。

曾静本是湖南靖州的一个落第书生——他倒是和日后洪秀全的身份颇为相似——曾静无意中读到康熙年间名儒吕留良的著作,其中有阐述夷夏之防的文句,他认为时任川陕总督的岳钟琪“系宋武穆王岳飞后裔”,必能“乘时反叛,为宋明复雠”。于是曾静派他的学生王熙持书往见岳钟琪,在曾静的书信里,雍正皇帝成了古今罕见的暴君,罪状有弑兄屠弟、谋父逼母、怀疑诛忠、贪财好色、性喜好杀等等,希望岳钟琪能够像他的先祖那样反抗夷狄,为汉人复仇。然而岳钟琪想必是被他的前任年羹尧的那92条大逆不道的罪名吓怕了,经过一番精心设计的审讯之后,王熙供出其师曾静的名字,并连同曾静以及其他嫌犯一起被押解到京师。

雍正虽然对死去的吕留良施以戮尸枭示的刑罚,但是他却无意诛杀曾静等人,他选择的方式是自我辩白,为自己洗刷凭空捏造的种种污名,此时曾静等人化身为被告身陷囹圄之中,而雍正自己则以原告身份安坐于庙堂之上。他把澄清自己、驳斥逆说的文字化为一篇篇谕旨,自己亲自选辑成册,达509页之多,共分四卷,大部分篇幅以雍正问话、曾静回话的方式构成,雍正将此书命名为《大义觉迷录》,即以儒家传统思想的“大义”来使那些误入迷途的人们有所觉悟。曾静供词的字体大小仅相当于雍正谕旨字体的一半,并且曾静在书中一直自称“弥天重犯”,《大义觉迷录》以曾静的一篇立誓改过自新的《归仁说》结束,直到此时,曾静的名字才得以重见天日。在书中,雍正说自己无一时一刻不以爱养天下苍生为念,那些凭空放在自己头顶上面的种种罪孽纯属子虚乌有;并且特别强调中华一体,不应以地域作为区分君主好坏的标准,极力说明清朝统治中国的合理性,无论华夷,都应维护以满族为统治民族的清政权。

雍正下令将此书刻印刊行,广布天下,连当时刚入大清版图的台湾省也收到书了。对于曾静,雍正决定既不杀他,也不关他,而是宽宥其罪,还赏给他1000两银子,将他安置于湖南观风整俗使李徽的手下,他的任务是每隔两个月宣讲一次圣谕和《大义觉迷录》。

因为是以两个人问答的形式呈现,所以如果这本书在今天出版,作者一栏应该并排写着两个名字:爱新觉罗·胤禛、曾静。可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两人缘悭一面,在自己的宠臣李卫的奏折上面,雍正自己批示:“但曾静朕未便见面。”

这么看起来,似乎一切都结束了,孰料随着雍正的暴亡,新上台的乾隆皇帝在料理完父亲的丧事后办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重审曾静大逆不道一案,将曾静、张熙等人一律凌迟处死,并下旨让各省督抚将《大义觉迷录》缴还礼部,统一销毁。长眠于泰陵的雍正皇帝不会想到,生前大兴文字狱的他,其精心编纂的著作竟然会是自己死后第一个被查禁的对象。

《雍正王朝之大义觉迷》,[美]史景迁著,温洽溢、吴家恒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2月出版,定价:38.00元

史景迁的叙述条理分明、张弛有度,他最后下结论说,雍正、乾隆父子两人其实都错了:雍正以为可以借助自我辩白来澄清自己,让谣言自生自灭,但他的子民却只记得了谣言而忘记了皇帝的苦心;乾隆以为把书销毁便能告慰父皇的在天之灵,而他的子民却固执地认为他这么做,就是因为书中的内容确有其事。

当时间的刻度转到1899年的时候,正像是150多年前曾静无意间发现吕留良的著作一样,流亡日本的维新人士无意间发现了《大义觉迷录》的抄本,这本书在历史的巧合之中枯木逢春、回光返照,成为了足以让晚清统治者难堪的绝佳物证。

潘家园书话

□金涛

瑞士籍德国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在他的《尼罗河传》的序言中说过:当他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写传记时,他的眼前仿佛看见了一条大河;而当他为一条河流写传记时,他看到的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大意)。最近,承蒙三联书店资深编辑朱竞梅博士馈赠三册侯仁之先生的著作,不胜欣喜,也不由地想起路德维希的这句颇有哲学意味的比喻。

作为《侯仁之文集》的煌煌大著,分别是《北京城的生命印记》、《历史地理学的视野》和《我从燕京大学来》,均为2009年出版,是侯仁之先生毕生致力于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术成果,也忠实地记录了他一生的生命轨迹。其中,《北京城的生命印记》收录55篇论文及相关文字,从河湖水系和地理环境的视角,对北京城的起源、形成、城址变迁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全面的探索,这是侯仁之先生享誉海内外的学术成就。

一位学者的生命轨迹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变迁的原因及其规律性探讨的学科,是一门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边缘学科,在我国,它还是一门新兴的学科。

侯仁之先生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还反映在他对我国沙漠地区环境变迁的研究。他所倡导的实地考察结合考古发掘、古代文献和碳14、孢粉分析等方法的综合研究,开辟了历史地理学传统方法与现代科技手段结合的新局面,使历史地理学在揭示环境变迁、复原古代地理面貌、预测环境变化趋势等方面,发挥一定的作用。这项开创性研究对于考察人类经济活动导致生态环境恶化,有着重大价值,对现实也有很具说服力的启示。有关沙漠历史地理的研究成果,以及城市与区域历史地理、历史地理的理论思考,是构成《历史地理学的视野》的主要内容。

任何一位有成就的科学家,他对人类的贡献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有形的,围绕他的发现、发明而衍生的论文、著作、讲演稿、设计图等学术成果,作为有形的文化遗产留给后人,惠及社会,这是社会公认的,也为科学界所肯定;另一方面则是无形的,科学家的学术成长经历,他的治学和师承,他从事专业研究的方法论和经验之谈。他若是有过教学经历,那他教书育人的体会,则是贯穿一生的无形的精神财产。在这方面,侯仁之先生的长寿和惊人的记忆力,为后学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师承史学大师洪业(煨莲)、顾颉刚教诲的经历。书中写到:“正是煨莲教授关于校园历史的研究,引导我进行对于北京西北郊区历史上著名园林区的实地考察,进而又扩大到对整个北京地区开发过程的研究。”侯仁之本科毕业后留校,做顾颉刚教授的助教,书中提到,“从1936年9月到1937年6月,顾颉刚教授别出心裁地开设了一门课,叫做‘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这对我是个极为难得的训练,也进一步启发了我对研究北京历史地理的兴趣”。后来负笈英伦,留学利物浦大学,师从著名历史地理学家Clifford Darby教授,“我深受Darby教授的影响,并把他所倡导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和方法,第一次介绍到中国来,并对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些收入《我从燕京大学来》的回忆,很具体地说明师承与弘扬、薪火相传的学术传统,追述了他一生在历史地理研究的漫长旅程的体会,渗透着浓浓的师生之情,读来非常感人。

“仁者寿”,侯仁之先生(1911年12月生)今年百岁了。

从《侯仁之文集》这部煌煌大著,我们仿佛看到了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如何从岩间的涓涓细流,从林中的小溪,在山野之间流淌,接纳了苍天与大地的雨水泉流,终于逐渐壮大起来,尽管也有过千难万险,迂回曲折,最终冲出深山峡谷,成为一条波澜壮阔的奔向大海的伟大的河流……

《北京城的生命印记》,侯仁之著,三联书店2009年3月出版,定价:56.00元

《历史地理学的视野》,侯仁之著,三联书店2009年3月出版,定价:55.00元

《我从燕京大学来》,侯仁之著,三联书店2009年5月出版,定价:69.80元

回不去的故乡

□李寅初

不久前,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散文家奖授予了耄耋之年的齐邦媛,获奖作品是《巨流河》。授奖词中说:“《巨流河》既实录个人命运,又深思国恨家愁。”齐邦媛“本着史家的诚恳,作家的生命关怀,以文立心,目击成诗”,成为了2010年度海峡两岸共同珍视的浊世清音。那些殉国者的热血,流亡者的热泪,回不去的故乡,少女的柔情与恋慕,在时间的长河里缓缓流动,带着淡淡的伤感与惆怅,相信每一个读过此书的人都难免动容。

然而本文要说的并不是齐邦媛与《巨流河》,而是其父齐世英及其自传。齐世英曾先后求学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德国柏林大学等,饱受新思想洗礼。他曾入幕东北军郭松龄部起兵反对张作霖,九一八事变至抗日战争胜利期间,四处奔波,折冲外交,救济难民,创办杂志。还曾接办东北大学和创立中国第一所国立中学——中山中学,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也是他一生引以为傲的事业。

齐世英与张学良、陈立夫、西安事变等重大人物、事件有极深渊源。其口述自传如今能够面世,对于理解那段血与泪的历史有着不小意义。我是先读完《齐世英口述自传》,再回头读《巨流河》的。两本书一硬一软,恰可对读,一是铮铮铁骨男儿,蜗居海岛,回首半生奋斗历程,一是温婉细腻女子,在耄耋之年,惊觉“不能不说出故事就离开”。《齐世英口述自传》的“硬”可能是因为它是由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访问的,这种访问大多注重传主经历的重大事件,于儿女情长殊少着墨,又加上齐世英“恬淡自处,可称为隐者”的性格,“硬”就难免了。比如,齐世英的口述中,就几乎没有提到他的妻子与女儿。而在其女的回忆中,乱世流离颠沛的苦痛哀乐,父母亲的一言一行,仿佛就在昨天一般,再加上她天生多愁善感,又是学文学的,熟读雪莱济慈,下笔自然哀婉动人,“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了。

齐世英一生的事业,是围绕东北展开的。考察中国近百年来的历史,东北之重要性,毋庸置疑。内忧外患,国势日弱,自清末日俄染指东北始,到国民党大败于辽沈战役,东北这块丰饶的土地饱经沧桑,多少好男儿为求国家独立富强、自由民主,离开故乡后就再也没能回去。齐邦媛说“20世纪,是埋藏巨大悲伤的世纪”。在齐邦媛的回忆中,一个不断提出的假设是,假如当年其父能够渡过“巨流河”,能够打败张作霖,历史会不会改写,这其实上也是其父在自传中不停反躬自问的假设。听齐世英说他与张学良的恩恩怨怨,与陈立夫、吉田茂的君子之交,说他一生为东北奔走,很难不感慨系之。我们后人读史,绝不能用一种粗鄙的态度,以成败论英雄。唯有以同情之眼光,才有可能隔着岁月的长河,触摸到他们那一代所秉持的理想和人性光辉,才能体悟到那一代的悲剧和幻灭。

当年日军侵占东北时,大批东北人流亡关内,一首名为《松花江上》的歌也随之传遍中国。“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那里有我的同胞,还有那衰老的爹娘”……这首歌深挚动人,唱出了游子的漂流之痛。歌中有一句是“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但对于齐世英来说,事实是,他至死都没能回到故乡。

《齐世英口述自传》,齐世英口述,沈云龙等访问,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年1月出版,定价:38.00元